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30,000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7—218—00444—x/K·99

定价3.50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在北撤谈判的日子里.....曾 生(1)
- 南路特委领导吴(川)化(县)廉(江)梅(菴)边地区
抗日武装斗争的回顾.....温焯华(24)
- 挺进粤湘边(上).....周 明(38)
- 风雨60年.....黄 康(79)
- 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所走过的道路
- 广东学生军事集训队和广东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
的基本情况与地下党活动.....莫福生 张江明 吴 仲(90)
- 南粤星火.....陈维康(110)
- 忆红十一军片断
- 战斗在广九铁路沿线的抗日“飞鹰队”
.....何通 黄克 张军 冼麟(123)
- 吊罗山风暴.....崔懋峰(143)
- 忆海南苗族人民革命斗争片断

怀 念 篇

- 忆罗梓铭同志.....李坚真(156)
- 能文善武 将兵楷模.....陈青山(160)
- 回忆李振亚同志
- 风范长存.....李又华 黄家驹 陈摩人(172)
- 回忆罗明副校长

专题资料

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情况及

其影响 广东省工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76)

粤桂边区党委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 陈光中 黄稻藩 (195)

党史人物

朱光传略 胡提春 叶创昌 黄永镇 (224)

抗战时期的廖承志 卢 荻 (255)

红岩凝碧血 南国树丰碑 罗梅腾 (280)

——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黄文杰

史实考证

中国首次“五一”节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 卜穗文 (291)

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的不同军队番号与不同政权

形式 曾 文 (295)

解放战争时期活动于粤桂湘三省边区党组织名称

的考证 韦敬文 (309)

在北撤谈判的日子里

曾 生

我们为什么要北撤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号召。

然而，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利益，准备大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以实现一党专治的反动统治。他依靠美国装备了20个机械化师，又靠着美国的空运，把西南大后方的军队运往我抗日根据地周围。蒋介石虽一心想发动内战，但鉴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鉴于国内外舆论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况且，要完成进攻解放区的战略部署，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蒋介石经过同美帝国主义密谋策划，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还采用“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妄图在谈判桌上逼我党交

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吞掉革命力量。为此，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居然戴上“和平”的假面具，在1945年9月14日至23日，一连3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①但与此同时，又放出大量谣言，胡说什么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普遍希望在日本投降后，中国能够出现一个和平的局面，以便休养生息。国民党的谣言虽然不会也不可能“一手遮天”，然而对于不明真相而又渴望和平的人们，多少也有影响。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就洞察到美蒋反动派会耍阴谋，在日寇宣布投降前的8月13日，毛泽东向延安干部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时就揭露了“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然而，对于蒋介石的两面派真面目，必须经过揭露和斗争，才能使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了解。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谣言，为了反映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要求，尽量制止内战，或把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党中央毅然决定派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

8月28日至10月10日，我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43天的谈判，并签定了双十协定。43天的谈判，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围绕着解放区民主政权和军队问题，双方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了保卫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的解放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作了不懈努力。但考虑到当时一些解放区所处的具体环境，考虑到要在斗争中取得主动权，我们作出让步，宣布将自己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中、

^① 《重庆谈判纪实》第376页。

皖南、湖北、湖南和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让出来，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提出来的。

谈判前后的尖锐斗争

1945年9月13日，华南的日军在广州履行受降签字，广东地区人民抗日战争从此结束。

华南日寇刚刚投降，当蒋介石还在重庆的谈判桌上高唱和平与民主的高调时，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我解放区进攻了。在广东，9月初，国民党政府就急调了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新八军和广东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以及广西的六十四军共8个军23个师的兵力来广东发动内战，到处烧、杀、抢、掠。10月25日，广州行辕又召开一个所谓“粤桂两省绥靖会议”，继续策划内战，提出要在3个月内肃清粤桂两省的“奸匪”。接着便抽调了90%的兵力，疯狂地向我东江、粤北、海南等解放区进行军事围攻。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遭到惨痛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时期虽是阴一套、阳一套，出尔反尔，但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全面地发动内战，为了迷惑人民，加紧准备内战。1946年1月5日，国民党与我们签定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并组成了有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面的代表参加的重庆“三人小组”进行监督。同时由三方面派出代表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处理具体问题。军调执行部的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同志。1月10日，军调执行部颁发了第一号命令——《停止军事冲突命令》，并规定此命令从13日24时起生效。

但是，《停止军事冲突命令》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密令各地，要在停战命令生效之前，抢夺战略要地，于是全国又内战四起。

1月13日，广东当局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更肆无忌惮地向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1月15日，国民党一五四师分三路进攻坪山、龙岗；新一军相继占领清溪、沙鱼涌等地；一五三师向江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琼崖，敌人集中两万兵力围攻琼崖纵队。

为了解决军事冲突，北平军调执行部颁发第二号命令，命双方军队隔离，恢复1月13日前的状况，并决定派出8个执行小组，到内战最激烈的济南、徐州、大同、张家口、赤峰、集宁、罗山、广州等地进行实地监督和调解。其第八执行小组被派往广州。该小组的主要成员是：中共方面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方面代表黄维勤少校，美国方面代表米勒上校。米勒上校并任第八执行小组主席。

1月25日，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广州行辕开始接触。这时的行辕主任张发奎正忙着执行蒋介石打内战的命令，决心要在1月底前消灭中共广东部队，根本不把执行小组放在眼里。当执行小组问及关于广东中共武装北撤问题时，张发奎竟矢口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为掩人耳目，他采用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法，于2月5日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信口雌黄，说什么他们“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在广东，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接着，他又大放厥词，故弄玄虚地说，广东只有“剿匪”，不存在执行停战命令的问题。甚至还说对第八小组“此来甚感惊诧”，大要掩耳盗铃勾当。张发奎之所以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说，其目的就在于要把东纵消灭

在广东。

对张发奎的诬蔑，方方同志提出抗议，并建议第八执行小组到东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起先，广州行辕多方进行阻拦，在阻拦不住的情况下，又急忙进行周密布置，使执行小组到东江后仍无法与东纵直接接触，而出面作证的都是经过他们挑选的假证人。这明明是张发奎一手导演的一场闹戏，然而中央社却无视这一事实，竟发布消息说，第八执行小组到现场视察后确认广东无中共军队。企图从舆论上为张发奎帮忙，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针对上述情况，我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通过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争取社会支持。1月31日，华南纵队发言人公开驳斥广州行辕的谬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掩饰近几个月来大举进攻中共军队及摧残解放区人民的罪行”；^① 2月15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言人发表重要谈话，用铁的事实阐明广东境内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确实存在，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当局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② 2月1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又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驳斥广东当局。并要求重庆三人委员会与北平军调执行部“迅速采取必要的步骤，纠正国民党当局此种错误言行，停止对华南抗日纵队的进攻与诬蔑”，^③ 2月22日，方方同志在广州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严正申明中央社发布的第八小组“调查知东江确无中共部队存在的消息，不能代表整个执行小组意见”。“但广州各报不敢把这话刊载出来”。^④ 在这同时，军调执行部的

^① 《东江纵队史料》第700页。

^② 《东江纵队史料》第710页。

^③ 《东江纵队史料》第708页。

^④ 《华商报》1946年2月19日第一版。

叶剑英又郑重地向重庆和广州方面交涉，“要求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①

这时，我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和香港的《华商报》都相继发表华南抗日纵队的功绩，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反击国民党对我们的攻击和诬蔑。

我方一次又一次的有理有据的发言，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暴露出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丑陋嘴脸，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从广东到香港舆论越来越倾向我们，而广州行辕却处在一片斥责声中。

其次，坚决进行自卫反击，从军事上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敌人对我们采取“分进合击”、“反复扫荡”、“重兵镇压”、“填空格”等战术，使用美式装备，大规模发动进攻，残杀我老区军民。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指示，在新形势下斗争方针是：坚决斗争，保存力量，坚决自卫。斗争方式采取分散活动，化整为零减少目标，在有利时则迅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各地党组织执行中央指示，对国民党的进攻开展自卫反击。南路我军在突破敌人的清剿后，挺进粤桂边的十万大山，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琼崖纵队奋勇抗击8个月，消灭敌四十六军十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东江纵队在惠、东、宝一带抗击敌新一军和六十三军的围攻，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与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损失形成了一比十的鲜明对照。

军事失利，千夫所指，张发奎陷入困境。正当他手足无措时，恰接到要他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他犹如绝路逢生，竟不辞而别，只身飞往重庆，广州只留下第八执行小组，谈判处于停顿状态。

^①《东江纵队史料》第711页。

我党为迫使国民党广东当局坐下来谈判，又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3月9日，中共中央电告林平：立即飞赴重庆，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代表身份与国民党谈判。即日，林平抵渝。11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他在重庆曾家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批驳了中央社的消息和广州行辕的滥言，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发展情况以及7年抗日的功绩，揭露了国民党广东当局否认它的阴谋。18日，周恩来又以他的名义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让林平在会上详细介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东江发动内战的情况。还向到会的中外记者散发了在抗日战争中被我营救过的盟国友人写的感谢信，以扩大东纵对国内外的影响。会上，周恩来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维护并监督双十协定的全部协议的实现。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赢得了国内外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民主人士蔡廷锴、民盟南方总部负责人李章达等也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3月22日，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惠东宝旅港各界促进家乡和平民主与救灾大会也在九龙举行，充分揭露国民党当局疯狂进行内战，到处屠杀掠夺人民，破坏和平民主罪行。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发出通电，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促进和平民主的实现。香港进步报纸用大量篇幅刊载东纵的战绩。宗教界人士撰文赞颂东纵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丰功伟绩。被东纵营救过的英美朋友发表公开谈话，声明东纵是一支英雄部队，表示坚决支持它。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特别是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遭到沉重打击的形势下，国民党广东当局

不得不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张发奎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后，终于在重庆与我们签定了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此次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当局要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保证其财产不受侵犯，保证其就业居住的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回广东后再谈。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更大成效，重庆三人委员会决定派一个三人会议代表团前往广州协助工作。此三人会议代表团的成员是：政府方面代表皮宗阉上校，中共方面代表廖承志先生，美方代表柯夷上校。三人会议代表团于3月31日到达广州。

林平、张发奎与三人会议代表团同机抵达广州，并一起参加谈判。

谈判伊始，张发奎又想食言，否认在重庆达成的协议，再次制造障碍，阻止东纵北撤。于是廖承志毫不客气地质问他道：“你老是口口声声说广东无中共武装，那你们过去发了那么多限共、容共、反共的密令，是针对谁的呢？”“目前你们又制定了绥靖密令，又是针对谁的呢？难道不是针对中共武装的吗？”几句出其不意的话问得张发奎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柯夷上校和皮宗阉上校也不支持张发奎如此愚蠢地纠缠下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讨价还价，4月2日，广州行营才与第八执行小组就东江停战和东纵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包括了3项原则、10项决议和1个决议附则，其全部内容是：

三人会议代表团来广州后，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及广州行营授权代表数度会商后，行营遵奉蒋委员长指示，在下列3原则下协助实施：一、登船地点：大鹏湾。二、人数：

两千余人（不得超过3000人）。三、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1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行营代表在上述三原则及停战命令下同代表团协商获得如下协议：

一、广东省内之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之中共武装人员2400人（其中包括妇孺300人），应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

二、上述人员之集中及登船之准备，自第八小组派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共1个月。距大鹏湾较远之地区（粤北）人员，若不能及时赶到，须宽限时日，要呈报三人会议决定之。

三、在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大鹏半岛期间，以及登船之前，大鹏半岛葵涌、王母圩等地之政府军队，应撤离该区若干距离，以便供中共人员作集中之用。

四、在中共武装人员集结及行军、登船过程中，广州行营绝对保证彼等之安全，并特别令其所属，不得有任何攻击行为。

五、上述中共武装人员集中转移过程中，广州行营同意代购粮食或供款予彼等购粮，广州行营方面并同意在运输、医药等方面给彼等一切可能之协助。

六、为执行上述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应以三人会议代表机关资格迅速组成并派出三个联络小组，分携电台到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调查，及协助中共武装人员至大鹏半岛集中登船，各联络小组均包括政府、中共及美国三方面之代表各一人。

七、广州行营派出宪兵若干人供第八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使用，随同联络小组出发，其人数与任务均由第八小组决定。诸宪兵在联络小组执行职务期间，须接受第八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之

命令。

八、中共方面之林平少将于决议重要原则确定后，即乘飞机出发，于3日内陪同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曾生少将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联络小组人员前来第八小组，以便和行营代表共同商讨撤退中共武装人员之具体细则事宜。3日之后，即作为委员长命令中提及之“调查开始日期”。政府方面允许保证上述人员公务来往之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之便利。

九、关于决议各点，执行之具体细则，由第八小组与广州行营代表及中共武装人员代表共同商、决进行。

十、本决议经三方面签字后，即付诸实施。

附记：

一、中共代表廖承志先生提出广东各地中共复员之武装人员及其家属，请政府保证不受歧视，并且一律享受复员法之待遇，同时并保障其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等一切自由，并要求行营发给中共复员人员证。行营代表王衡少将表示可保证政府不歧视奉公守法之中共复员人员。

二、中共代表廖承志先生说明：“中共领导下的东江武装问题，今已原则上解决，但并非说广东全省问题均已解决。中共领导下的琼崖纵队问题，希望能以同样的诚意及速度解决之。”对此，政府代表皮上校说，柯夷上校曾说：“此问题已由重庆三人会议谈过，但尚未获得协议。本人此来乃为处理东江问题，无权处理海南问题。”柯夷上校作结论时称：“本人保证将海南问题提交重庆三人会议讨论。”

三、中共廖承志先生提出第八小组中共方面电台最近受到破坏，希望广州行营保证以后不要再有此现象发生，并希望广州行营迅速答复中共代表使用电台问题。行营代表王衡少将表示，使

用电台问题已请示重庆，破坏问题则并无所闻。政府代表皮上校答复到重庆后当负责催请政府迅速答复。柯夷上校说明：“重庆允许，即可使用”。

东江停火和东纵北撤的决议既达成，三人会议代表团的工作告完成。4月3日，三人会议代表团飞返重庆，关于执行决议的具体工作留交第八执行小组。因我方电台遭破坏，廖承志临走时把他的电台留给方方使用，但不久又被破坏了。

按照决议中的第八条规定，4月3日，林平由穗返港，邀我一起赴穗谈判。4月4日，我和他一起在广东当局选派的一名副官和几名宪兵的所谓“保护”下，由九龙尖沙嘴乘火车前往广州。和我们同行的工作人员有戴机、林立、彭丰、林展4人（后曾文、魏林风等10人也陆续抵穗参加谈判工作）。戴机、林立2人任通讯官，彭丰为副官，林展是翻译官。我们当日上午从九龙动身，是日晚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万户萧疏，生灵涂炭，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残腿断臂的国民党兵遍布街市。昔日繁华的沿江路一带到处可以看到用破报纸、破草席掩盖着的饿尸，景象十分凄惨，目不忍睹。偌大的一个广州死一般沉寂，笼罩在恐怖之中。

军调小组和谈判人员都住在沙面原苏联领事馆内（复兴路64号）。美方代表住在3楼，我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分住在2楼的左、右两边。最底下的一层住的是卫兵、勤务人员和国民党特务，把这座红砖砌叠的3层楼牢牢地监护起来。

我们到了住地，方方早已等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华南中共抗日武装北撤山东解放区，第八小组的任务就是尽力使这一协议能早日实现。我们中共代表要起主导作用，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高度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表面言和、背后捣鬼的惯技，要抓紧时间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林

平同志紧接着方方的话说：“打来打去，国民党吃不掉我们，这才承认了我们，和我们签定了协议。但这只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信不得！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还得做更艰苦的斗争。我估计他们不会让我们顺利北撤，因此我们3个人都不能捆在这里，一定要想办法走脱一个去指挥部队。”方方和林平的一席话，把当时谈判的形势、斗争的目标和方针都讲清楚了，这使新参加谈判的我，心里有了底。当时我考虑，3个人是得走1个，然而谁走得了呢？方方是走不脱的，他是第八小组成员。我也走不了，敌人当时的目标就是对准我，所以才叫我来的。林平是政委，按照敌人的认识，政委只会做思想工作，不会打仗，若是他走，可能会容易些。林平同意我的分析，于是决定他想办法回部队。我对他说：“你回部队后，要把协定上的条款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让大家提高警惕，千万别在集结时受围攻，更要注意别让人家一锅端了。”方方也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又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后，才分头去休息。这时，夜已经很深了，又坐了一天的车，本已很疲劳，但我却没有丝毫睡意，仍思索着以后的斗争，想尽量把困难和问题想得更复杂些。

果然不出我所料，后来的谈判，越接触具体问题，斗争也就越尖锐、越复杂。

三人会议代表团飞返重庆后，我们与广州行营代表就对如何派出支组与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东纵部队进行联络，部队集结的行军路线与时间，北撤及复员人员的粮款等具体问题开始进行谈判。

这时，敌人对谈判仍不感兴趣，他们正集中兵力向江南、江北及惠阳、紫金、海陆丰边境的我军进攻，谈判只不过是为了延宕时间，配合军事进攻，所以没有丝毫诚意。尽管大家相遇时客